

江光亮 著

抗美援朝运动中江西省的 民众动员研究

The Public Mobilization of
the Movement to Resist U.S. and Aid Korea
in Jiangxi Province

江光亮 著

抗美援朝运动中江西省的 民众动员研究

The Public Mobilization of
the Movement to Resist U.S. and Aid Korea
in Jiangxi Province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美援朝运动中江西省的民众动员研究 / 江光亮著.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210-10845-0

I. ①抗… II. ①江… III. ①抗美援朝运动-战争动
员-研究-江西 IV. ①D65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4626 号

抗美援朝运动中江西省的民众动员研究

江光亮 著

责任编辑: 李月华

封面设计: 章 雷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8143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15

邮 编: 330006

网 址: www.jxpsh.com

E-mail: 270446326@qq.com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16, 720mm × 1000mm

印 张: 19.125

字 数: 350 千字

ISBN 978-7-210-10845-0

定 价: 68.00 元

承印厂: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赣版权登字—01—2018—105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论

一、选题缘由	1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7
三、研究重点和基本思路	14

第一章 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江西的政治社会状况

第一节 建国之初江西的基本形势	17
第二节 朝鲜战争爆发对江西的影响	35

第二章 江西民众动员的概况

第一节 民众动员的三大主题	46
第二节 民众动员的基本过程	66

第三章 江西民众动员的组织

第一节 民众动员的领导机构	78
第二节 民众动员的骨干力量	84
第三节 民众动员的组织制度	100

第四章 面向乡村民众的动员

第一节 训练运动骨干 展开时事宣传	111
第二节 组织集会游行 推动自我教育	123
第三节 推行爱国公约 融入农村工作	149

第五章 面向城市民众的动员

第一节 民众动员的全面展开	190
第二节 民众动员与各阶层实际的结合	206
第三节 民众动员的主要成效	231

第六章 抗美援朝运动民众动员与其他运动的关系

第一节 与土地改革运动的关系	247
第二节 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关系	265

结论

一、江西民众动员的基本方式	282
二、江西民众动员的主要特点	285
三、江西民众动员与新政权建设的关系	287

参考文献	291
------------	-----

后记	300
----------	-----

绪 论

一、选题缘由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运动无疑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在朝鲜发生国际战争的形势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旗帜的一系列运动,诸如和平签名、武器捐献、爱国公约、参军优抚、爱国卫生等运动,对新中国的巩固和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此期间,抗美援朝运动与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紧密结合,“三套锣鼓一起敲”,不但有力地支援了这场大规模对外战争,而且加速了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权威,推动了新中国的政权建设。

(一) 中国近现代历史提出的时代命题

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化、强大统一的国家,是20世纪中国人民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害和蹂躏之苦,沦为受多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之后,民族独立,恢复国家主权,以民族独立的国家形态与各国共存于世界,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1]。而进行广泛深入的民众动员则是建成现代化、强大统一国家的前提条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支持政治整合和前期社会改革的彻底的动员必须先于新体制的制度化’。”^[2]

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动员最广泛的民众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对于建立一个现代化、高度集权的国家和中央政府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作用。毛泽东曾经指出,抗美援朝运动在中国引起一个反帝高

[1] 彭敦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6页。

[2] 徐彬:《前进中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1921-1966)》,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潮，“这是一个很大的高潮。这个高潮非常有益，不仅把美帝的侵略打退了，而且又对中国各方面工作有很大的推动和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在军事上加速了国防建设，在政治上加强了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了，经济上加强了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在文化教育方面把帝国主义的影响打退了，使中国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面貌为之一新”^[1]。

因此，对于抗美援朝运动，我们并不能仅从新中国支援朝鲜的角度来评价认识，而是要从世界冷战背景下全面促进新中国的巩固、建设和现代化的高度来探讨其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这其中既含有对中国近现代史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也有对当下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的现实观照。

（二）现有研究成果提出的学术课题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抗美援朝运动的研究已逾60年。研究者们从国际关系、世界冷战格局，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进行探讨，不断地发掘着它与世界、中国历史发展的联系，使该领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密切关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热点。“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了抗美援朝的政治性、历史性、复杂性，它不是来去匆匆的瞬间，而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的永恒。”^[2]

纵观前40年研究，有关抗美援朝运动研究成果基本停留在运动过程、特点与意义的宏观叙述上，主旨是弘扬抗美援朝对于支援战争加强国防建设、提升国际地位以及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精神力量。在该主题的挖掘下，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出版了一大批文献资料。

早在抗美援朝期间的1950至1953年，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就编辑出版了一系列的相关资料：《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参考资料索引》《抗美援朝时事问答》《怎样在农村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怎样在城市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怎样在工人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事学习宣传手册》《抗美援朝重要文献言论汇编》等。1954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辑出版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一书，共160余万字，汇集

[1]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2] 薛庆超：《敢于抉择并敢于胜利》，《人民日报》2014年4月15日。

了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止的有关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文件和相关资料,成为抗美援朝运动文献资料的集大成者。以上这些书籍为研究抗美援朝运动提供了丰富资料。但是“由于1959年,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抗美援朝战争研究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基本停止。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研究才得以恢复”^[1]。

20世纪80年代开始,抗美援朝运动文献整理和出版工作形成了新高潮。这期间,在全国及地方相关部门的组织下,一批涉及抗美援朝运动文献相继出版。一方面,中央有关部门编辑出版了抗美援朝运动相关历史文献和专著,如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等,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辑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辑的《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辑的《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等。专门论著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曹延平写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支援抗美援朝纪实》、中国军事博物馆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风云录》、邓力群等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之《抗美援朝战争》等著作,也为研究抗美援朝运动提供了必备的参考资料。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史部门出版了区域类的档案资料,如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辑的《抗美援朝运动在江苏》、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陈丽君主编的《南京抗美援朝运动》、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河北省抗美援朝运动》、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吉林省的抗美援朝运动》等等。其中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5年编辑的《江西抗美援朝运动》,整理了运动档案、新闻报道、典型经验、大事记等系列资料达15万字。这为我们研究地方抗美援朝运动提供了珍贵的基础资料。

同时,“抗美援朝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某些部门组织力量编写,学者个人可

[1] 齐德学、郭志刚:《抗美援朝战争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

以开展研究,发表意见,陈述看法”。^[1]特别是1990年以后,俄国关于朝鲜战争期间中、苏、朝等国领导往来函电等档案相继解密,一批参与朝鲜战争苏联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的回忆录和采访录出版,从而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的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讲,在中共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领域,抗美援朝运动的学术研究此时才算真正启动。这期间抗美援朝运动研究取得了一批新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类:

在国内学者方面,除了少数研究者对俄国档案深入挖掘外,大多数研究者仍然致力于总结抗美援朝运动的意义与方法,特别是在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工作以及爱国公约等运动方面的经验。积极使用俄国档案材料的学者主要是沈志华,他发表了《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2]等论文,并出版了《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著作,成为在该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在抗美援朝运动意义与经验研究方面,除有孙丹的《论抗美援朝战争的国内宣传工作》^[3]、田居俭的《抗美援朝运动与“三视”教育》^[4]、王力文的《筑起心中的长城:试论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5]、褚凤英的《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初探》^[6]、尹永纯的《1951年增产节约运动的历史回顾》^[7]、王新生的《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公约运动》^[8]等论文外,还有刘宏煊主编的《抗美援朝研究论文集》、张星星主编的《抗美援朝60年后的回眸》等文集。

同时,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地区抗美援朝运动的展开情况及特色研究。比如向济萍的《广西的抗美援朝运动》^[9],欧阳小松的《福建抗美援朝运动回顾》^[10],兰兵、官明的《吉林省人民抗美援朝斗争的回顾》^[11],吕红的《浙江抗美援朝运动

[1] 刘国新:《抗美援朝研究简述》,《光明日报》2000年10月27日。

[2] 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

[3] 孙丹:《论抗美援朝战争的国内宣传工作》,《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4] 田居俭:《抗美援朝运动与“三视”教育》,《高校理论战线》2000年第12期。

[5] 王力文:《筑起心中的长城:试论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党史纵横》1994年第4期。

[6] 褚凤英:《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初探》,《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7] 尹永纯:《1951年增产节约运动的历史回顾》,《北京党史》2006年2期。

[8] 王新生:《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公约运动》,《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2期。

[9] 向济萍:《广西的抗美援朝运动》,《广西党史》2000年第6期。

[10] 欧阳小松:《福建抗美援朝运动回顾》,《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4期。

[11] 兰兵、官明:《吉林省人民抗美援朝斗争的回顾》,《兰台内外》2010年第5期。

回顾》^[1],潘红霞的《临桂县的抗美援朝运动》^[2],辛补堂的《五台人民在抗美援朝中的活动》^[3],付小东等的《抗美援朝运动在甘肃》^[4],庞家陵的《强烈的爱国主义 巨大的奉献精神——记四川抗美援朝运动》^[5],王宏的《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的一些特点》^[6]等论文。这些成果的发表丰富了地方性抗美援朝运动研究,但其中部分成果仅限于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和运动过程介绍,对运动展开深入分析的较欠缺。

与大陆学者的研究相比,港台学者和国外学者对抗美援朝运动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它与国际国内政治的关系,因此表现在研究成果上间接的多,直接的少。比如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R. 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杰弗里·帕克的《剑桥战争史》、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莫里斯·梅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等,这些著作都论及抗美援朝运动,但所涉内容并不多。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为,抗美援朝运动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加强了新政权革命权威,推动了党对社会的渗透和改造。如有美国学者认为,1950年下半年,“大致在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的同时,中共的社会规划加强了势头,群众被发动起来,它的政权比开始时远为彻底的方式向社会渗透”^[7]。虽然海外学者的观点对我们研究视野有所拓展,但是他们所持观点往往没有充分的材料来论证与说明,这也是海外抗美援朝运动研究存在的重要局限。

近年来,研究者对抗美援朝的研究不断增强,开始尝试从不同角度,借助其他学科知识和分析方法,对抗美援朝运动进行学理分析和多层面考察。比如,南京大学博士生靳道亮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国家、战争和动员:抗美援朝研究——以江苏地区为中心》中,从国家政权建设角度,通过对国家和社会各阶层关系的考察来审视抗美援朝运动,指出中国共产党把抗美援朝动员与土地改革相结合,成功地将国

[1] 吕红:《浙江抗美援朝运动回顾》,《浙江档案》2000年第10期。

[2] 潘红霞:《临桂县的抗美援朝运动》,《广西党史》1996年第5期。

[3] 辛补堂:《五台人民在抗美援朝中的活动》,《山西文史资料》1994年第5期。

[4] 付小东、谢燕春:《抗美援朝运动在甘肃》,《发展》2009年第9期。

[5] 庞家陵:《强烈的爱国主义 巨大的奉献精神——记四川抗美援朝运动》,《四川档案》2013年第3期。

[6] 王宏:《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的一些特点》,《北京党史》2000年第3期。

[7] [美] 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

家意识、国家话语全面覆盖乡村，促使了农民国家意识的初步产生，并推进了政权各项建设。在此基础上，他发表的《抗美援朝运动与乡村社会国家意识的塑造》论文，对乡村抗美援朝运动微观生态进行了考察，提出“国家对农民利益的关注和民族国家话语的注入，促使了农民国家意识的初步产生”。中央党校博士生侯松涛在《抗美援朝运动与民众社会心态研究》中对抗美援朝时期中国民众的不同社会心态及其转变过程做了深入考察。她指出，这期间的中国社会表现出一个重大特征就是，“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凝聚力、向心力特别强”，并分析了这一转变过程的最突出特点是社会心理转变过程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转变结果的“一律性”“简单性”的统一。中国社科院博士生程珂在其博士论文《抗美援朝战争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作重心的转移》中，考察了抗美援朝战争与大规模经济建设启动之间的关系，认为战争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的部署，但也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建设热情，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更是进入了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战争期间取得国民经济恢复的巨大成绩。此外，学者杨奎松教授曾引用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抗美援朝有很多好处，使我们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了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来论述抗美援朝运动对国内政治的重要意义，他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借此造成一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以便从根本上强化对广大基层民众的政治教育，树立新政权的革命权威”^[1]。这些研究的视角从只重视宏大叙事发展到基层民众心理考察，以及研究运动与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之间的关系，开拓了研究的视野范围和深度。

但从总体上看，目前抗美援朝运动研究仍存在不足，主要有：（1）有重大价值的、富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并不多见，特别是对抗美援朝运动做出深刻历史反思与考察的学术精品较少；（2）微观研究较少，特别是对于乡村抗美援朝运动展开和一地为例的专题研究还有待加强，虽然近年来利用地方档案进行实证研究的论文不断发表，但对乡村运动展开和农民参与运动的反应做深入考察还不多见。（3）研究的视角较单一，就目前成果而言，研究多从革命史范畴，集中于从爱国主义、革命英

[1]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雄主义、国际主义的角度进行叙述,从民众动员、社会转型、现代化的角度研究得较少,整体研究还不够丰富和立体。

因此,本书试图以江西省为中心,分析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国际战争形势下掀起国内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考察抗美援朝运动在基层的展开演进历程,讨论运动如何实现对国内不同阶层民众的政治整合,从而深入研究这场运动中民众动员^[1]问题,以期对该领域研究增添新内容,更加丰富立体。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在明确研究的主要问题之后,本书将对研究对象及相关核心概念进行阐释和界定。

(一) 关于抗美援朝运动

对于抗美援朝运动,学界代表性提法主要有三种:一是认为抗美援朝运动即是军事斗争,国内民众动员只是支援战争的子运动。但对于这场战争,各方称法不一,比如有的称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战争、韩国战争、祖国解放战争等。其中,抗美援朝战争^[2]是中国官方的称法,祖国解放战争是朝鲜方面的称法,韩战则主要是美、韩等海外学术界及官方的称法。这几种称法都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中性的称法则是朝鲜战争,也就是指发生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与中国、朝鲜三

[1] 本书无意严格区分政治动员、社会动员和民众动员。对于刚刚从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于民众动员、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并无太严格的界限,“过去,在革命战争时代,在政治运动中,社会动员就是政治动员”。参见郑杭生:《论现代社会的社会动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毛泽东亦强调,党在革命时期政治动员最大的成就是“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可以说,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的落脚点都是民众,二者也可认为是民众动员的方式和途径。

[2] 中国所称的抗美援朝战争,一般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派出志愿军于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赴朝进行的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战争。虽然中国官方通常称为抗美援朝战争,但亦有抗美援朝战争和朝鲜战争互用的情况。比如,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讲话中曾表述:“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参见毛泽东:《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2页。

方的战争。^[1]

二是认为抗美援朝运动不包括军事战争,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领导展开的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动员运动,“全国人民用踊跃参加志愿军,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在各条战线上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实际行动来支援战争”^[2]。这不仅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神上的支持,也紧密结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对稳定建国初期社会政治秩序发挥了重大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战争理论在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实践”^[3]。

三是认为抗美援朝运动“既包括军事、外交斗争,也涉及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有著作认为,抗美援朝运动是“1950-1953年中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一场全民性的斗争”。“应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中国政府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为了保家卫国,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为了巩固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后方,中国从1950年10月起,在各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1年起,国内又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三反’‘五反’运动。至1953年,这些运动都先后取得胜利。”^[4]

有学者还进一步对抗美援朝运动的内涵和外延做出了界定。孙启泰认为,“抗美援朝运动的内涵,包括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台湾,援助朝鲜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保卫中朝人民革命胜利果实的直接性活动。其外延则包括各项对抗美援朝有间接影响和推动作用的活动”。如果把问题进一步展开,抗美援朝运动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抗美援朝战争,这是整个运动的核心”;二是“中国人民为反

[1] 参与此次战争的并不只这三方,苏联军队(主要是空军)也投入了战斗。苏联空军在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的第七天便投入空战,并在空战中成为中朝方面的主力军。据战后苏联统计,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苏联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作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最多时达到25000至26000人。苏联空军的歼击机总共击落了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总共击落了212架敌机。根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在朝鲜,苏联航空兵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人员。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军人的总损失为299人。参见薛海玲:《朝鲜战争中苏联对华军事援助探析》,《军事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此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曾以各种方式进行着秘密的“抗美援朝运动”(参见本文第80页)。据资料显示,“1952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国曾向朝鲜派出一支200人的队伍(包括医疗队和一个警卫连)。几个月后,这支队伍在西梅村战地医院遭遇到了渗透过来的美军小分队,捷克斯洛伐克警卫连拿起武器,奋勇击溃了数倍于己的美军。”参见雷炎:《捷克斯洛伐克曾“抗美援朝”》,《中国国防报》2010年9月14日。

[2]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

[3] 齐德学、邓礼峰:《抗美援朝运动的组织领导与开展》,孙世富主编:《支援抗美援朝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4] 邓力群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1949-199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203页。

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而在物质上、道义上所采取的各种行动”；三是“在抗美援朝的推动下形成和发展的各种群众性活动”。^[1]

本研究认为，第三种说法较为符合历史事实，这亦是美国情报界、学术界和新闻界对运动的代表性认识。^[2]抗美援朝运动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军事和外交斗争，即支援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二是围绕着支援战争在国内的大规模的民众动员，包括为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台湾，保卫世界和平所举行的游行示威与和平签名运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针对抗美援朝所发表的声明、宣言和各种集会；开展“三视”教育为中心内容的抗美援朝爱国宣传教育活动；动员参军参战支前活动；组织慰问团赴朝鲜前线慰问活动；开展订立爱国公约和增产节约活动；组织捐献飞机大炮等。三是在抗美援朝背景下发动的系列社会改造和政治运动，如思想改造、宗教界“三自革新”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爱国卫生运动等，“在所有这些运动中，都有仇美、反美的主题”。“虽然每个运动都有其自身基本的目标，但是它们也都同时指责‘美国人是帝国主义者，是法西斯侵略者’。”因此，抗美援朝运动的意义，“就不仅仅局限于战争的结果，而要从更广泛的视野和更高层次来认识”。^[3]

[1] 孙启泰：《论抗美援朝运动》，见刘宏煊主编：《抗美援朝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8页。

[2] 对于抗美援朝运动，1953年的美国政府情报界“并不把它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运动，而是把它看成了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所有反美运动的总和，并把它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认为1950年10月至1952年2月期间，中共通过成立‘抗美援朝’委员会将反美活动陡然升级；而1952年2月以后，伴随着反细菌战的宣传，抗美援朝活动已经从反美变成了仇美”。参见贺艳青：《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和政治运动的分析与评估》，《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在美国学界，著名学者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等认为，“这些运动都是在1950年后期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发动的，它们的激烈程度无疑和朝鲜有关。党的领导人看到保持警惕的真正必要性，这不仅由于美国进攻的危险性，而且由于国民党重返大陆的可能性”。参见〔美〕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此外，美国著名记者、《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曾对中国共产党颇为认同。他于1949年4月的《邮报》撰文中表示，“经过10余年的直接研究，我认为，苏维埃俄国难以有效地直接控制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美国“彻底抛弃干涉主义，历史发展所需要的所有必要前提现在已具备。中国将成为独立的，不受莫斯科指挥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重要国家”。但是，在中国出兵朝鲜参战、国内大规模抗美援朝运动高潮之际的1951年，斯诺改变了上述观点。他在《民族》杂志撰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欧亚共产轴心国”自愿、忠诚的伙伴，中国南方与印度支那的交界地带被生动地称为“苏联帝国的外缘”，而中国则是共产党集团革命战略棋盘上的亚洲棋手。参见〔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魏彬、周德林译：《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8—351页。

[3] 贺艳青：《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和政治运动的分析与评估》，《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

对外战争本身即是强大的动员令。“中国转变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最初阶段的动力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正是在外部压力的刺激下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1]事实上,抗美援朝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也与志愿军在朝鲜战争取得的显著战绩有密切关系,也的确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可以说,国外的战争形势与国内的民众动员是紧密联系,并达到了两者的互相配合、相互促进。

本研究认为,抗美援朝运动是指中国共产党和新政权,为支援朝鲜战争,围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主题,在全国(包括华人、华侨、留学生)^[2]展开的大规模民众动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的系列运动和工作,有力推动了新中国政权巩固和建设。本研究以江西省为中心,侧重于国内民众动员的考察,但也涉及军事、外交及其对国内民众动员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二) 关于民众动员

首先,关于民众。关于“民”字意义,《辞海》有三种解释:(1)人民。(2)古代泛指被统治的庶人。(3)泛指人或人类^[3]。《说文解字》对“民”字解释为:“民众萌也”,“萌犹懵懵无知见也”^[4],可以理解为无知无识的人,即一般老百姓。关于“众”字的解释,《新华词典》的解释为“大多数或很多”^[5]。关于“民众”,《汉语大词典》注解为:(1)众民,人民。(2)人民众多^[6]。英语等于“民众”的单词

[1] 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2] 抗美援朝运动兴起后,旅居国外的华侨,除了极少数地区外,全都积极行动起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掀起了反美爱国,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热潮。据1953年12月3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公布的数据,1952年1月22日—1953年8月31日,海外华侨捐款数大致为434359753元。大批的华侨青年回国参军,亲赴战场抗美援朝。从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朝战结束的四年时间,海外华侨掀起了回国保卫、建设新中国的热潮,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华侨的第三次支援祖国的高潮。据中侨委的统计数字表明,这期间共有17.8万多人从海外回国。他们中的许多人抛开侨居国各种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回来为保卫、建设祖国出力,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参见刘华:《华侨、归侨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支援》,刘宏煊主编《抗美援朝研究》,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7—359页。根据资料统计,在抗美援朝运动前后的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拥有800多人的留美科协会员“大部陆续回国”;截至1955年,归国留美人员有近千人。其中有钱学森、华罗庚、郭永怀、邓稼先、张文裕等一大批杰出俊才。参见垣火:《归去来兮——新中国成立初期留美人员回国历险记》,《新华文摘》2014年第7期。

[3] 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21页。

[4]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65页。

[5]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86页。

[6]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6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8页。

为“the masses”,“the common people”^[1],基本意义为“persons in general”,即普通人。

近代以来,“民众”概念日益为中国社会所广泛使用。而且,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群众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决定着历史的进程和历史的结局”逐渐被更多人接受。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民众大联合》一文就称:“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2]

本研究认为,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民众”是指,全国各族、各阶层的人民(包括华人、华侨、留学生),其主体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

其次,关于动员。“动员”起初意为“出师准备”或“能动之员”^[3]。《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动员”定义为:“在战时或国家发生其他紧急状况时,组织武装部队积极从事军事行动。就其全部范围来讲,动员是指组织一国的全部资源支援军事行动。20世纪的技术进步,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大大增加了制订和执行动员计划的复杂性。”“动员的成效不仅要善于组织,而且要诸事按部就班地进行。”^[4]

《汉语大词典》将“动员”解释为:“(1)军事术语。把国家的武装力量由和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以及把所有的经济部门(工业、农业、运输业等)转入供应战争需要的工作。(2)发动人参加某项活动。”^[5]在《新华词典》中的注解是:“(1)战争发生时,国家发动和调动一切力量以应战时需要;(2)发动人们参加某项活动。”^[6]“动员”基本意义是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对特定对象所展开的宣传、教育、组织等工作。按照方式、特点及性质标准,动员一般可分为政治动员、社会

[1] [英] Martin H. Manser 主编,朱原、吴景荣等编译:《精选英汉汉英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3 版,第 334 页。

[2] 毛泽东:《民众大联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92 页。

[3] 见张羽:《求证“动员”词源》,《国防》2004 年第 3 期;张杰:《“动员”词源略考》,《国防》2004 年第 4 期。

[4]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 11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6 页。

[5]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 2 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02 页。

[6] 商务印书馆:《新华词典》,商务出版社 2001 年修订版,第 222 页。

动员^[1]、经济动员、文化动员、军事动员等。

作为军事用语的“动员”，现已被非军事领域所广泛应用。本研究认为，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动员既包含了严格意义上的战争动员，即为了赢得朝鲜战争胜利而开展参军、参战、慰问、捐献、优抚等军事动员活动；又包含了更多的由朝鲜战争引发或与朝鲜战争有间接性关联的群众运动，即有全体民众或特定民众参与各种运动，比如反帝爱国游行示威、和平签名运动、订立爱国公约、增产节约、思想改造、宗教“革新”、爱国丰产、爱国卫生等非军事领域的动员运动。

再其次，关于民众动员。“民众动员”概念在《辞海》《辞源》《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汉语大词典》等中都没有条目。1938年，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发布《组织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的方案》中提出“民众动员”基本方法，即“为了保证民众动员之有效施行，必须彻底革新政治，健全基层组织；加强训练干部，推进现代政治，完成基层建设”^[2]。冯玉祥等在《民众动员问题》一书中提出“民众动员”应作为国家总动员(Mobilisation)的一部分，即“所谓国家总动员是一个交战国家的所具有的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完全在有计划的统制之下，动员最高的力量来争取战争的胜利。所谓民众动员，就是说要全体民众团结一起来直接或间接参加抗日战争。”^[3]这其中，毛泽东对于“民众动员”认识更进一步，并有许多经典论述：“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

[1] 关于政治动员、社会动员，有学者从概念和要素两个方面做了比较：一是从概念上看，社会动员是社会学中的专业概念，社会动员一般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标，通过各种形式的高强度的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以促使特定的对象形成或改变一定的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从而产生持续性的参与行为和其他预期性行为的过程。政治动员是政治学中的专业概念，一般是指特定政治领导者或是领导群以某种系统的价值观或信仰，说服、诱导或强制本政治团体成员或其他社会成员，获得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引导他们自愿服从和主动配合，以实现特定目标、任务和行为的过程。二是从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政治动员侧重“对社会进行动员”，而社会动员则侧重“由社会来进行动员”。政治动员往往不自觉地运用权威地位和政治权力等强制力量向动员对象进行直接介入和宣传灌输等，因此动员主体带有强制性，而动员客体则带有服从性和被动性。社会动员因其内涵的广泛性往往是由社会主体主动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的行为活动，因此动员主体和客体之间地位相对平等，带有主动性、自主性和选择性等特点。参见唐明勇、孙晓晖：《危机与应对——新中国视野下危机事件与社会动员个案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51、53页。

[2]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文史研究委员会编：《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166页。

[3] 冯玉祥等：《民众动员问题》，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37页。

[4]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